学术专论

《四库全书》与李氏朝鲜后期的文坛动向*

陈冰冰

[摘要] 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编纂了中国古代最大的官修书——《四库全书》，它的出现给中国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促进了中国文献典籍的保存和传播。同时，《四库全书》也给邻邦朝鲜的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对朝鲜后期的文体改革，朝鲜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四库全书》　朝鲜　正祖　文体反正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2）－02－0076－05

The *Siku Quanshu* and the Literary Trends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its power, the Qing court compiled the largest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collection of books——the *Siku Quanshu*, which greatly impacted on scholarship and culture and contributed to preser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books in China. Meanwhile, the *Siku Quanshu* also influenced the literary field and played a key role in reforming the literary style and developing literature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清朝政府统一中原以后，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一方面使用武力加强社会的安定，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文化的控制进一步钳制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对当时的汉族文人。清朝统治者极力提倡复古文风和考证学，并且通过文字狱等政治手段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而很多文人为避免文祸，不得不将自己的注意力从现实问题转向对古籍文献的学习和整理方面。清朝统治期间多次举行过大规模的图书编纂活动，这种活动表面上看来是出于对图书文献的保存和整理，而实际上是清朝政府为了消解汉族的抵抗情绪而实行的一种文化策略。他们把有关反对清朝统治的文章和书籍重新编版或直接进行销毁，而《四库全书》的编纂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文化产物。《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中国典籍史上最后的，也是规模最大的官纂校录。《四库全书》给中国的学术和文坛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而同时在邻国朝鲜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推动了朝鲜文坛的变革与发展。本文通过朝鲜文献资料，分析朝鲜文人对《四库全书》的认识和看法，并进一步探究《四库全书》对整个朝鲜文坛的影响。

一、朝鲜文人对《四库全书》的认识

《四库全书》编纂于乾隆年间，1772 年开始，经过十年而编成。《四库全书》问世的时期，相当于朝鲜李氏王朝的后期，李朝文人对《四库全书》一直非常感兴趣。《四库全书》中收录了一部分朝鲜人的著作，徐修浩在《燕行记》中有如下的记载，“纪曰：‘贵

[收稿日期] 2011－10－20
[作者简介] 陈冰冰（1981—），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师；北京 100024

国郑麟趾高丽史，极有体段，仆藏庋一部矣。’余曰：‘然则高丽史已翻刻于坊间乎?’纪曰：‘即贵国板本也，贵国徐敬德花潭集，编入四库全书别集类，外国诗文集之编诸四库，千载一人而已。’”[①]由此可见，徐敬德的《花潭集》和郑麟趾的《高丽史》都被《四库全书》收录在内，并且《高丽史》原是在朝鲜刊行的版本。但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并未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留有记载，徐修浩的这一记载对我们研究《四库全书》是很有价值的。

此外，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也提到了徐敬德的《花潭集》，但是朴趾源认为徐敬德的诗文虽然有若干篇，但是却“无可观”。其实，徐敬德的《花潭集》只是在存目中留有书目，其内容并未记载在《四库全书》中，《四库全书总目》中记载的“诗文虽不入格，特存其目，以表其人焉”，朴趾源当时并未看到《四库全书》的原文，所以才误以为《花潭集》已编入其中，不过他所说的“无可观”同《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记载还是一致的。《花潭集》中的诗文并非是特别优秀的，但却是唯一被收录在存目中的外国人诗文集，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清朝进行大规模的图书编纂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政权统治，是对知识分子实行的一种怀柔政策，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将知识文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图书的整理和编纂上来。据统计，参与《四库全书》编纂活动的学者被分成 20 个官职，共 362 人。[②]除此之外，还有誊录从事者 2800 多名，佣人 1000 多名，此次编纂活动共出动人员 4200 多名。这些人员中只有少数一部分在中国史料中能够找到相关记载，其余大部分人员的事迹很少被记录下来，而朝鲜学者们却对这一部分人格外的关心，他们作品中的记载弥补了中国资料这方面的不足。

朴趾源在其《热河日记》中对皇六子永瑢的外貌就做过详细的记载：“面白而痘瘢狼藉，鼻梁低小，颊辅甚广”，他认为永瑢虽贵为皇子，但却缺乏贵族气质。中国史料中虽然有不少关于永瑢的记载，但对其容貌描写如此详尽的仅朴趾源一人。不过除了外貌，朴趾源对永瑢的评价还是极高的，“能文章工书画”，所以他作为四库全书总裁官还是理所应当的。作品中还记载了一些专门从事誊录工作的人员，他们主要以誊录官的身份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每月的工作量也是相当惊人，朝鲜文人李德懋在其《入燕记》中记载道，“绍薪方充《四库全书》誊录官，自言一月誊五万字”[③]。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从事誊录工作的人员每月工作量相当惊人。这些参与编写《四库全书》的知识文人，虽然都拥有较好的文笔和卓越的文才，却不得不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规模巨大的图书编纂工作上，以至于很难有机会把蕴含自己真正思想的文学著作留给后人，这便达到了清朝统治者大规模编写《四库全书》的真正目的。

乾隆帝大举编纂《四库全书》，一方面是告示天下自己对文学的热爱，自己的好学；另一方面，也就是其主要的目的则是为了抹杀反清思想，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东华录》中记载道：“至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碍，现降谕旨甚明，即使将来进到时，其中或有妄诞字句，不应留贻后学者，亦不过将书毁弃。传论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关涉，必不肯因此加罪”[④]。对于这一点，中国的学者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所以中国的史料中并未留下充分的论述，而朝鲜学者们没有了身份上的限制，自然就少了很多的忌讳，他们的评价则更具体一些。

不过，因为当时的李朝学者并没有真正接触过《四库全书》原书，所以他们对《四库全书》本身的评价是比较空洞的。洪良浩在《燕云纪行》“皇都即事”中记载：“节制八旗恢远略，铺张《四库》盛文儒（时皇帝大聚天下书分经史子集，名为《四库全书》，合数万卷，募士民有文笔者给禄缮写，故云）。升平五纪超前代，只是衣裳异典谟。”这些评论，仅仅是流于一般的赞颂，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可言。但是朝鲜学者对《四库全书》的修书动机及其影响的评论还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朴趾源曾经指出：“皇帝集天下之士，征海内之书为《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率天下而唱之，曰：此紫阳之绪言，而考亭之遗旨也。其所以动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

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⑤]他认为康熙时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时代的《四库全书》的编纂一样，并不是所谓的标榜朱子主义的文化政策，而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汉人知识分子而进行的一种思想上的压制。

通过大规模的图书收集，把其中对清朝统治不利的部分删除掉，这是编纂工作的主要目的，从1774年至1793年，清朝政府共禁毁书籍3100种，15万部。朴趾源认为清朝大举编纂《四库全书》，其实质跟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并无太大的区别，只是跟秦始皇相比，乾隆帝做得更巧妙一些，称“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像秦始皇那样光明正大地对图书进行焚烧，对文人进行坑杀，而是打着“崇古右文之治”的旗号，来实现同样的目的。

当然，《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中国典籍的保存也有着重要意义。虽然众多的书籍被烧毁，但是很多个人的藏书经过收集和誊录，得以向大众公开，得以在社会广泛流传，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对于这一点，朝鲜文人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二、《四库全书》与李朝正祖的“文体反正”

李朝中后期以来，朝鲜文坛一直受到晚明文风的巨大影响，自许筠（1569—1618）以来，晚明时期的文集便开始流入朝鲜，并给朝鲜文坛带来了巨大影响。他在《闲情录》中引用的大部分书籍都是当时李朝社会所批判的小品文和杂说。洪万宗（1643—1725）在《旬五志》中写道，“至大明末，诸文士尤尚浮藻，凿空构虚辄成一部，至于坐衙按簿之官，越视职事，务得新语”。这本书写于1678年，也就是说在17世纪末朝鲜文坛就已经出现了有关晚明文风过于浮华的评价，但当时并未形成主流思想，直到李朝正祖（在位1776—1801）实行“文体反正”之后，朝鲜文坛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祖自继位初便特别关注《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他曾专门派进贺兼谢恩史徐浩修前往清朝去购买《四库全书》。[⑥]《四库全书》中的很多主张同正祖的思想都是一致的，如《四库全书》的宗旨是“朱子尊崇”，“崇尚雅醇”，凡是与此宗旨相违背的书籍则全部销毁，只在存目中留有记载，这一点和李朝统治者为禁止“稗官杂记”的传播而实行的“文体反正”的宗旨是一致的。正祖认为稗官小说原非正统文学，其内容“噍杀鄙俚”，是蛊惑民心的罪魁祸首，也容易使知识文人陷入异学。而这些论调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识部分中有关晚明文风的记载是相一致的，“是编皆其笔记之文……大抵词义轻薄，不出当时小品之习”。清朝政府一方面排斥当时拟古文派的文风，一方面对那些浮藻、轻薄的文风也进行严厉的批判，这一点和朝鲜正祖的主张是十分相似的，而纂修《四库全书》时，“厘正诗体、崇尚雅醇之至意”[⑦]为正祖进行文体改革提供了依据，以此纠正当时耽于稗官小品的创作文风，所以《四库全书》的编纂活动才会受到正祖的格外关注。

正祖认为“大抵文体随世不同，而一世之间亦或屡变，惟时之所尚而其盛衰兴替，未尝不与政通矣”[⑧]。即文学与政治是一脉相通的，要想巩固好国家的统治，首先要把文学思想统一起来。在其统治期间一直提倡使用醇正的古文体，他认为知识文人一旦陷入小品文的创作，便会无视人伦，违背义理，而要返回正道则必须消灭小品文。正祖还认为做文章没有古今之区别，其道理都是一样的，“文何曾有古今之别也，文是一也，但作之者自有古人今人之同不同耳”[⑨]。正祖还特意将此制定为一种文化政策，作为当时的朝鲜文人进行文学创作的前提。

正祖于1794年下令消除以稗官小品体为代表的杂文体，倡导正统的古文体，主张还原纯正的文体，这就是所谓的“文体反正”。即把无“道”的新式文体，转化成“道”在其中的旧式文体的一种文学运动。正祖将此作为国家纲纪来统一文人思想，把批判浮华不实的晚明文风作为国家政策来执行。《四库全书》的出现给正祖的“文体反正”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也更加坚定了正祖肃清文风、纠正文体的信念。正祖推行“文体反正”，一方面把传统的古文体树为人们应该效

仿的文章典范，另一方面还设立了宫廷研究机关奎章阁。即把国内的学者召集在此，讨论经史，出版书籍，以摘选朱子语类的《朱子选统》为首，刊行唐宋八大家著名的古文集。正祖还下令禁止清朝的稗官小说和杂书的输入。正是由于“文体反正”的实行，导致李朝后期刚刚兴起的稗官小品体文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而古文文风重又盛极一时。所以，“文体反正”是正祖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和封建社会秩序而实施的一项政策，但这一政策却扼制了人们的积极进步思想。

正祖在进行文体改革之后，李朝社会的稗官文学创作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一部分文人坚持进行稗官小品体的创作，而他们最终却遭受迫害，如李钰、金祖淳、南宫辄等。特别是李钰（1760—1813），他坚持主体意识下的民族文学论，认为文学应该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任何一种文体都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所谓的古文体已经不能够用来反映现实问题，他反对法古，强调写实性的文学表现手法，并且在参加科举考试时也使用稗官小说体撰写文章，所以招致正祖的极大反感，不但科举考试一再落榜，最后还落了个“停举”“充军”的下场。虽然李钰因为稗官文体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却始终不向权势低头，一生坚持小品文的创作，对朝鲜李朝小品文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另一部分文人则采用比较迂回的策略，避免与正祖提倡的“文体反正”正面冲突。虽然这部分文人同拟古派一样力推古文，但是他们主张学习六经古文和唐宋古文的创新精神，并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文学，这就是著名的“法古创新”，而这一思想的主要倡导人就是实学派代表朴趾源。以朴趾源为代表的朝鲜文人，表面上依据古文体进行创作，而实质却是以儒教为基础，主张进行社会改革，而且他们提出，文章的创作应该摒弃传统习惯上的模仿，去创作反应本国国风的朝鲜诗、朝鲜文章，这些主张深得正祖的认可。所以，以朴趾源为代表的朝鲜文人，如李德懋、朴齐家等，即使被发现存在文体上的问题，也并没有受到正祖的严惩，而只是命其写自责问。可以说，这批朝鲜文人在文体改革的浪潮下，不但没有被吞噬，反而取得了更大的辉煌，创作出了朝鲜文坛上较具有代表性的燕岩文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热河日记》。该书主要以朝鲜为社会背景，采用大量的朝鲜谚语和俗语，反对使用奢华、虚浮的语言，反对盲目地模仿汉唐文学和文体；同时也揭露了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端和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和发展社会的实质性主张。

正祖的“文体反正”虽然表面上净化了朝鲜的文风和文体，使纯正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以六经古文作为纯正文学典范的创作要求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变化。而另一方面，稗史小品体也并没有因为统治者的阻挠而销声匿迹，相反，稗官小品体、小说等新文体依旧在朝鲜社会上广泛流传。

三、《四库全书》与李朝后期的文学思潮

当时朝鲜的知识文人对《四库全书》的编纂非常关心，朝鲜学者李德懋曾于正祖四年（1780）这样记载到，“《四库全书》踰十万卷，活字先印其最要者二万余卷，活字即木字也，其序即诏文也，后当得送。”这里所说的“活字先印其最要者二万余卷”指的是《四库全书》的聚珍版，这一工作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虽然只是《四库全书》的一部分，但却已在当时的朝鲜社会引起反响，这足以看出当时朝鲜文学界对这部书籍的关注。

进入李朝社会，中朝两国文人学士交往更加密切，许多赴清使节回国后，极力主张向清朝社会学习，包括学习清朝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这就是所谓的北学派。“北学”一词是由朴齐家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游北京归后所著《北学议》而来。北学派对朝鲜国内相对于清朝的种种欠缺做了较为全面的检讨，并提出学习清朝先进的科技和文化，其中就包括对文学创作的学习和借鉴。

北学派代表朴趾源、李德懋等朝鲜四大家提倡新文学，他们反对古文的枯燥无味，倡导使用更具生命力、词藻优美的新文学，这一主张同《四库全书总目》流入朝鲜有着极大的

关系。《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乾隆末年编成印行不久后传入了朝鲜。朴趾源等进步文人在接触了《四库全书》的小识部分以后，指出明末清初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所使用的语言中有很多是属于“妙慧”、“奇诡”、“尖酸”的范畴，并且还强调，“平日于文学好看批评小品，探索者惟是妙慧之解，深味者无非尖酸之语，此等虽年少一时之嗜好，渐到老实则自然刊落。”他主张“法古创新”，提出要克服拟古文和骈体文的弊端，学习六经古文及唐宋古文的创新精神。

此外，经常拥护公安派代表袁宏道的李德懋也多次强调不要学习明末清初文集及稗官小品中“浮靡”、“轻薄”的风气，他指出“毋或浮靡，字句之间，慎勿犯用俗所谓小说及明末清初一种比例轻薄口气”[⑩]。主张北学的进步文人曾一度把袁宏道等人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然而《四库全书》的问世，却让他们的文学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以至于在正祖九年以后，这些文人基本上没有再进行过小品文的创作，这虽然跟正祖所实行的“文体反正”有一定的关系，但《四库全书》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另一方面，朝鲜的著书开始纷纷效仿《四库全书》的编写。正祖五年（1781），由徐浩修编纂的《奎章总目》就是仿照《四库全书》编写而成，分成经、史、子、集四个部分，并且还收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12册。《大畜观书目》（成书约在正祖中期）也收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16套（函）共144册，《四库全书目录》（应即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12册。另外，洪奭周的《洪氏读书录》也是分成了四部，各个部分前都著有小序，每本书中均拟有提要，甚至连提要的写法也跟《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相似。《海东绎史——艺文志》一书，更是大量地直接抄录《四库全书》提要。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不仅给中国的学术和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还牵动着邻国朝鲜，对朝鲜文坛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朝鲜文献中保存着很多有关四库学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可以作为中国文献的补充和参考，弥补中国文献中存在的缺漏，从而有助于我们的四库学研究。同时，通过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学习，也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对朝鲜文坛的影响。

---

①徐修浩 《燕行记》卷3，起圆明圆至燕京，30日戊申，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其中陆费墀和王嘉曾是一身兼二职，所以实际人员为360名。中华书局，2003年。

③李德懋 《青庄馆全书》卷16，雅亭遗稿8《族侄·初》，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④《东华录》乾隆三十八年三月条，中华书局，1980年。

⑤朴趾源 《热河日记》卷4，审势编，朱瑞平校点本，上海书店，1997年。

⑥《正祖大王实录》卷3，正祖元年（1776）三月，己未日条，第17—19页。

⑦《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六日谕，中华书局，2003年。

⑧《弘斋全书》卷49，《策问》文体，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⑨《弘斋全书》卷162，《日得錄》，文学，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814年。

⑩李德懋 《雅贞遗稿》卷7，《与朴在先斋家书》，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